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文丛

王 军 主编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 《红高粱》文本阐释



潘琳琳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文丛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红高粱》文本阐释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of *Red Sorgh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潘琳琳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红高粱》文本阐释 =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of Red Sorgh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 潘琳琳著

· 一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8. 9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文丛 / 王军主编)

ISBN 978-7-5672-2544-2

I. ①翻…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文学翻译-
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3943 号

书 名: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红高粱》文本阐释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of Red Sorgh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著 者: 潘琳琳

责任编辑: 施 萍

策划编辑: 汤定军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 - mail: tangdingjun@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7481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07 千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544-2

定 价: 4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7481020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文丛》

编委会

顾问 胡壮麟

编委会主任 王铭玉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

丁尔苏 胡壮麟 唐小林

王军 王腊宝 王铭玉

辛斌 熊学亮 杨信彰

张杰 张德禄 赵毅衡

主 编 王军

策 划 汤定军

序

数字化信息时代传播媒介的多元化使得符际翻译越来越被重视，从而融入了翻译实践的层面。今天，翻译的对象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字文本，图片、绘画、影像、戏剧等多模态的符号文本也成为翻译的对象，因为这是提升文化传播的时效和功效的重要途径。构建大格局、大翻译之下的语符翻译很有必要，大格局下的大翻译意味着翻译活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它不仅是语内的，还是语际的、符际的，是罗曼·雅各布森描述的三类翻译的混合体。我之所以把这种翻译称为大翻译，是因为大翻译不以个体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强调的不是个体的文字翻译，而是翻译中文本的叙事方式、经典形成以及传播的有效性。大翻译是文本能指所能产生的任何形式，它是文本的混合体，其视觉效果是马赛克的，非远看而不能窥其全景。其重要作用也因时间的推移而愈发突显。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探讨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不断呼吁从集体文化记忆的角度思考国家层面上的具有大格局的“大翻译”，呼吁学者们从世界性、全球化、超文本、跨学科的层面来思考翻译问题，不仅要注重共时的政、经、文、体的翻译，还要注重历时的典籍翻译和文献翻译。要从地缘性角度来挖掘翻译资源，通过共时和历时的翻译研究来形成中国翻译的大格局，产生翻译研究的大数据。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着眼经典的研究，经典存在阐释之上，阐释建立在理论循环之上，经典、阐释与理论循环，就在技术和概念层面上催生了一个主体与客体、语境与文本、符号与能指共生共存、相互作用的场域。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转换研究视角，去迎接一个“大翻译”时代的到来。大翻译以阐释、翻译和文化意象建构为主要目的，它不仅具有跨学科特征，还具有跨符际特征，跨越各种异质符号的边界来探讨翻译与文化传播问题，语言与非语言艺术符号的结合和糅杂便构成了大翻译的基础。

潘琳琳博士就是一个与时俱进、转换视角的年轻学者，她的专著《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红高粱〉文本阐释》不畏艰难，着眼于理论研究的现实迫切性，关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符号学和翻译学的学科现状，思考二者结合的相关问题，为翻译符号学这一初创学科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该书虚实结合，理法并重。前三章明理，以翻译符号学为理论基础，重构了适用于翻译符号学的域内、域际和超域三类译域范畴，进而建构了翻译符号学文本阐释的一般性模式，即文学文本内外部理解、阐释和转换的整体系统与操作模式。后五章论法，以《红高粱》的不同文本为翻译实例，验证翻译符号学文本阐释模式的可行性，解释小说原创在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电影等不同译域中符号转换的规律，并分析不同符号文本差异产生的客观因素，以及不同符号的功能对翻译实践以及翻译结果的影响。同时，本书还阐述了译者作为符号使用者和阐释者的角色与作用，以及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受到互文性、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论证的基础上，本书得出翻译符号学对于不同类型翻译中的符码转换具有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导的作用，可以在作者、译者以及读者之间建立互动与转换的关系，以此达到文本文化内容的有效传播。

从整体而言，本书敢于大胆创新，用跨学科的观点来审视翻译学研究。努力做到“术道结合”。“术”因“道”的存在而得到理论升华，“道”因“术”的注入而关注操作方法的可行性，“互为道术”的学科理念在本书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本书的特色可大体归纳为如下几点：（1）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翻译符号学研究方面，国内多为宏观探索，本书在宏观指导下进行了微观探析，为翻译符号学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实验平台，凸显了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2）体现了“大翻译”之格局。本书紧扣“符码转换”之主旨，打破了“语际翻译”之限制，开拓了“域内”“超域”疆界，展开了“全译”研究，给翻译学带来了新的视角。（3）文本分析具有整体性。国内有些翻译研究为了追求理论的针对性，常常会选料“配餐”，这样做会影响学术研究的可信度。而本书从翻译符号学视角探讨《红高粱》作品的系列文本，避免了语料的碎片化，增强了符号学的透视力和翻译学的解释力。《红高粱》的四种文本界面很宽，它们正是以多种表意符号的同场运行而产生了深刻的符号意义。文本复杂性造就了其研究的跨学

科、跨文化、跨介质的多元符号综合特性。尽管难度很大，但本书作者还是成功地完成了写作任务，表现出良好的学术能力。

透过本书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翻译符号学这门新兴学科恰逢其时，前景光明，作为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学科，其学科建设的方向和格局应该是整体性的、世界性的、具有前瞻性的。当然，本书的顶层设计还可以更加系统化，理论也有待深化，在分析案例的关联性方面仍然有提升的空间。这是每一个理论探索者必须经历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本书作者大体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致力于研究新时代的新问题，寻求在发展中解决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构建问题。我希望潘琳琳博士不断努力精进，捷报频传！是为序。

罗选民

2018年5月25日

前 言

我对符号学最初的认识源于2005年硕士研究生期间选修的语言学课程,彼时我对符号学的了解粗浅而模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门学科包罗万象、深奥驳杂,并不是我可以轻易驾驭的学问。2005年至2014年这十年间,尽管我也陆续阅读过不少符号学的论著,却始终觉得它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般遥不可及。2014年至2018年,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幸参加了多次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和年会,学界前辈的精彩发言以及他们对符号学的深刻理解使我眼界大开,符号学这门学问才在我眼中逐渐变得亲切、鲜活起来。

通过大量的阅读,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符号学的养分,在逐步理清它的基本概念、核心要素、方法工具之后,我与符号学的距离从遥远到迫近,我对符号学的理解也从模糊到清晰。本书最初的撰写计划始于2015年,我被符号学理论的跨学科生命力所深深吸引,并萌生了用符号学之光照耀翻译研究的初步想法,于是形成了本书的基本构思。历经四年,本书终于正式完稿,这四年的时光是我倾心倾情于学术研究的四年,其间虽然时常因为一个学术概念而晨夕推敲,旬日踟蹰,但或许正是由于内心深处的这份赤诚与孤勇,才使得这段学术之途于平凡时也流光溢彩,于黯淡处也生出光辉。

符号学和翻译学均为研究交际和意义的科学,均涉及符号的使用、阐释与操纵。符号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翻译实践研究对符号学又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符号学进入翻译领域,使其脱离“玄学”而彰显其生命价值,翻译的本质、规律、模式等也可在更为开放、互动、系统的理论框架下得到最大程度的解释。

在国外,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合流始于20世纪中叶,受美国符号学家

皮尔士 (Charles S. Peirce) 的符号学理论启发, 美国符号学家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荷兰符号学家格雷 (Dinda L. Gorlée)、爱沙尼亚共和国符号学家特洛普 (Peeter Torop)、美国符号学家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 等学者通过不断的建构与重构、批判与阐释, 将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的星星之火发展至燎原之势, 启迪了学界同仁不断扩大符号学的研究边界, 推动了符号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国内对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的研究早已有之, 但多数研究囿于以符号学术语诠释翻译现象, 而且目光仅聚焦于语际翻译范畴, 忽略了广义翻译范畴中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双向转换。在此背景下, 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 在符号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下, 探究广义翻译范畴下的符码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就显得必要且迫切。符号学之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应运而生, 其宏观理论的构建和微观应用的探究符合当今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本书写作的动因与价值所在。

本书的内容组织遵循着从宏观到微观的认识逻辑, 即从翻译符号学的宏观性指导原则到翻译符号学的微观应用层面。在宏观理论层面, 本书以皮尔士符号学三元观为主要理论依托, 思考并分析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概念和理论内涵, 进而从翻译符指过程的发生机制、翻译符号学的逻辑推理模型和翻译符号学的译域建构三方面建构了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 批判分析了雅各布森之三类译域, 参酌洛特曼提出的“符号域”概念, 并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译域的不同分类, 重构了适用于翻译符号学之域内翻译、域际翻译和超域翻译三类译域范畴。

在微观应用层面, 本书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电影四种符号文本之间的符指过程和符号转换关系为案例, 验证了翻译符号学文本阐释模式的可行性。本书选择的语料均来自《红高粱》系列作品, 呈现了多种符号文本模态的间性特征, 又涉及多个符号主体之间的互动, 从小说语言文字符号走向电影之多介质跨媒体合成符号, 历经域内翻译、域际翻译及超域翻译三类译域范畴, 其符号形态之多元、译域范畴之宽阔、符指过程之复杂有利于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翻译符号学的学理系统。通过案例分析, 本书揭示了小说在域内翻译、域际翻译和超域翻译中符码转换的规律与意义再生的特征, 具体涉及: 符号意义的增减、符号层级的转换和符号功效的衍化; 在文化、政治、伦理的多

重翻译环境中,造成各符号文本共性与差异的深层主客观因素;作为符号使用者和阐释者的译者在翻译符号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主体间性、互文性、意识形态对于符号意义的产生、阐释与传播的影响等相关问题。从而系统地构建了文学作品与电影作品的符号文本链,解读了跨介质符号文本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传播效果与影响。

本书在未有成型套式可供借鉴的条件下建构而成的翻译符号学文本阐释模式适用于研究不同翻译类型中的符码转换规律与内部机制,从而得出符号的文本阐释机制应以符号意义的解读、阐释与再生为主旨,关注三种符号主体(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与转换,并透视互文性、主体间性、意识形态与符码转换的关系。与此同时,《红高粱》文学文本的多媒介、跨介质传播是在互文体系中构建集体文化记忆的有效传播模式,并为推动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构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个案,由此案例推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文本的对外传播模式应是符号文本域内翻译、域际翻译和超域翻译相辅相成并有机结合的整体系统。

本书在宏观层面建构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在微观层面全面系统分析《红高粱》的四种文本是一种学术尝试,希望对符号学研究、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符号学的建立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本书深化了翻译符号学的思考空间,阐释、补充、发展、完善了这一中国本土化的初创理论,进而拓展了符号学的类型研究,有利于推动和推进中国符号学的研究进程;另一方面,本书从翻译符号学的视角研究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电影符号文本的符码转换,使得翻译现象进入符号学的视野,翻译的指称与定义、翻译的本质、规律及模式等均可得到最大限度的解释,这对于我们拓展对翻译的理解、进入视野和格局更为宏大的大翻译研究时代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本书的撰写既强调内容的前沿性和针对性,又注重结构的层次性和系统性,适用于翻译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研究方向的教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作参考用书,也可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资料来源。

本书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博士生导师封一函教授的指引和关怀,他广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敏锐的学术思维深刻地影响着我。感谢王铭玉教授、罗选民教授、文军教授、司显柱教授、杜维平教授、

贾洪伟副教授、董洪川教授及封宗信教授在此书撰写的过程中给予的点拨与扶持。感谢爱沙尼亚共和国符号学家特洛普无私分享给我的学术论文及学术专著，其中蕴含的思想点燃了我的学术灵感，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感谢美国翻译理论家、符号学家罗宾逊的新书分享、邮件解惑，并接受我的访谈，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语言能力都使我获益良多。感谢莫言先生的女儿管笑笑女士提供了获取《红高粱》电影剧本、台本定稿的线索，使我最终成功搜集到珍贵的文献资料。

本书的完成得到我的家人及众多师友的倾力支持与帮助，也得益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良好、开放的学术氛围，在此一并致谢！同时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汤定军先生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限于水平，本书难免存在文字的疏漏及观点的偏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潘琳琳

2018年4月27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1.1 研究背景 / 3

1.2 研究问题与对象 / 5

1.3 理论依据 / 7

1.3.1 翻译的再界定 / 7

1.3.2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观 / 9

1.4 研究方法 / 12

1.5 研究意义 / 13

1.5.1 理论意义 / 13

1.5.2 现实意义 / 14

1.6 本书结构 / 14

第二章 符号学与翻译学研究综述 / 16

2.1 国外研究综述 / 16

2.1.1 普通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 17

2.1.2 社会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 31

2.2 国内研究综述 / 33

2.2.1 普通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 36

2.2.2 社会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 40

2.3 小说与电影的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 41

2.3.1 小说文本的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 41

2.3.2 电影文本的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 43

2.3.3 小说转换为电影的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 45

2.4 小结 / 48

第三章 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 50

- 3.1 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 50
 - 3.1.1 翻译学理论基础 / 50
 - 3.1.2 符号学理论基础 / 53
 - 3.1.3 翻译学与符号学联姻的理据 / 56
- 3.2 翻译符号学的界定 / 59
- 3.3 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 / 62
 - 3.3.1 翻译符指过程的发生机制 / 63
 - 3.3.2 翻译符号学的逻辑推理模型 / 68
 - 3.3.3 翻译符号学的译域建构：域内翻译、域际翻译及超域翻译 / 71
- 3.4 小结 / 79

第四章 《红高粱》的域内翻译 / 80

- 4.1 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的符号转换过程分析 / 80
 - 4.1.1 叙事形式上的符号转换 / 82
 - 4.1.2 叙事内容上的符号转换 / 84
- 4.2 影响小说、电影剧本及电影台本符号转换的因素 / 90
 - 4.2.1 符号本体内部因素 / 90
 - 4.2.2 符号本体外部因素 / 93
- 4.3 小结 / 102

第五章 《红高粱》的域际翻译 / 104

- 5.1 字幕翻译的运作机制 / 104
 - 5.1.1 字幕翻译的定义 / 104
 - 5.1.2 字幕与视听符号的互动关联 / 106
- 5.2 电影字幕翻译的翻译符号学阐释 / 109
 - 5.2.1 字幕翻译的符号三要素 / 110
 - 5.2.2 字幕翻译的过程 / 111
 - 5.2.3 字幕翻译中的对等问题 / 112
- 5.3 《红高粱》电影字幕的翻译符指过程分析 / 114
 - 5.3.1 文化词语的字幕翻译策略 / 114
 - 5.3.2 四首歌曲的字幕翻译策略 / 120

5.4 小结 / 131

第六章 《红高粱》的超域翻译 / 133

6.1 电影台本与电影的符号转换分析 / 133

6.1.1 叙事形式上的符号转换 / 135

6.1.2 叙事内容上的符号转换 / 138

6.2 符号文本的主体间性 / 156

6.2.1 符号主体间的对话互动关系 / 157

6.2.2 符号主体间的转换关系 / 159

6.3 小结 / 160

第七章 《红高粱》符号文本链的互文场域 / 162

7.1 互文性的狭义与广义 / 162

7.2 《红高粱》符号文本的互文性 / 164

7.2.1 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电影的历时互文关系 / 165

7.2.2 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电影与社会语境的共时互文关系 / 170

7.3 小结 / 173

第八章 结论 / 175

8.1 研究发现 / 175

8.1.1 翻译符号学文本阐释模式的可行性 / 175

8.1.2 符号文本阐释的机制 / 179

8.1.3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文本对外传播的模式 / 182

8.2 研究价值与展望 / 183

参考文献 / 186

第一章 绪论

符号学与翻译学的联姻不但丰富了符号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各自的研究内容,还催生了自成一体的研究取向——翻译符号学,引发国内外学界的持续关注,研究热潮自始不衰。

在国外,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合流始于20世纪中叶,受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的符号学理论启发,美国符号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荷兰符号学家格雷(Dinda L. Gorfée)、爱沙尼亚共和国符号学家特洛普(Peeter Torop)、美国符号学家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等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以符号本质及其转换规律为切入点的翻译问题。

在国内,自1988年《中国翻译》率先刊发符号学与翻译关系问题的论文以来,至今相关研究走过了近三十年的里程,虽存质量良莠不齐之现象,但的确积累了很多扎实的研究成果。细究之下,符号学与翻译学结合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亟待提高,翻译现象中的符号学本质尚未得到系统的研究,符号学也未深入考察翻译范畴的符号转换问题。客观而言,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雅各布森所定义的语言翻译范畴(Jakobson, 1959: 233),着重语言符号之间的阐释与转换,忽略了广义翻译范畴^①中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双向转换,如文本转换为影像、思想转换为文本等。因此,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在符号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引下,探究广义翻译范畴下的符号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更显得必要且深具挑战,符号学之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应运而生,其宏观理论的构建和微观应用的探究符合当今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价值显而易见。

翻译符号学在国内仍处于萌发阶段,目前已有少数学者如王铭玉(2015; 2016)等从理论层面,探讨了翻译符号学的定义与性质、概念与

① 有关翻译所指的狭义与广义范畴,笔者在本章1.3理论依据另辟专节论述。

指称、研究对象、学科内涵等,但对于翻译符号学微观应用的考察则少之又少^①,尤其是从翻译过程中的符号转换机制和本质出发,论及跨越语言文字符号、跨越多重符号呈现介质的符号间性转换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小说的文本阐释涉及小说与其衍生文本之间符码的多介质跨媒体转换与传播,为上述翻译符号学的微观应用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语料与素材。翻译这一符指过程始于原符号文本,经过译者的阐释,不断地生成符号解释项,从而颠覆和重组原符号文本,创生全新的符号文本。这一过程将翻译研究的疆域延伸至广义语言符号之外,契合翻译符号学的研究范围,而对于小说信息跨介质传输的元创作^②本质与过程的探究,也正属于翻译符号学的实践操作层面。

本书以翻译符号学理论框架为基础,尝试建构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在论证翻译符指过程发生机制与翻译符号学的逻辑推理模型的基础上,批判分析雅各布森之三类译域,参酌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Juri Lotman)提出的“符号域”概念,并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译域的不同分类,重构适用于翻译符号学辖域内微观研究之域内翻译、域际翻译和超域翻译三类译域范畴^③,再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电影的翻译符指过程及符号转换本质为研究对象,验证翻译符号学文本阐释模式的可行性,进而探讨翻译符号学理论的微观应用,以丰富翻译

① 目前翻译符号学的微观应用研究的论文寥寥可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从翻译符号学看中央文献术语俄译的策略》(吕红周,2015)和《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文本再生——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为例》(潘琳琳,2016a)。前者涉及雅各布森之语际翻译层面,后者涉及语内翻译层面,二者均未涉及符际翻译层面。

② 符指间性创生原文本的二次、派生创作,称为语码间性翻译或媒介间元创作。元创作意味着艺术间的变更(互动),创生文化——文学、音乐、雕刻、图片等元文本,读者、听众或专业口笔译者将显性和隐性的修改内容和注疏融入其中。(格雷,2015:89)

③ 本书对这三类译域的界定为:域内翻译是指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可细分为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之间的转换,以及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有形符号)转换过程中必然涉及的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思维符号(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域际翻译是指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之间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可细分为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之间的转换,以及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有形符号)转换过程中必然涉及的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思维符号(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超域翻译是指同一民族文化范畴或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下符号文本超越语言符号所组成的“域”的边界而进行的转换,涉及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之间、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之间、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复合性符号(由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构成的有形符号)之间、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复合性符号(由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构成的有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以及上述有形符号之间转换过程中必然涉及的有形符号与思维无形符号之间的双向转换。关于这三类译域范畴的构建、论证与分析,详见本书的第三章。

符号学的思考空间,阐释、补充、发展并完善这一中国本土化的初创理论。

本书选择的语料《红高粱》系列作品呈现了多种符号文本模态(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及电影)的间性特征,又涉及多个符号主体(作者、编剧、导演、演员、观众等)之间的互动,从小说语言文字符号走向电影之跨媒体多介质复合性符号,历经域内翻译、域际翻译及超越翻译三类译域范畴,属于典型符号文本,其符号形态之多元、译域范畴之宽阔、符指过程之复杂引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1.1 研究背景

《红高粱》^①是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其发表曾引起国内文坛的轰动,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标志性的文学事件之一,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87年《红高粱》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2000年荣获《亚洲周刊》(香港)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是莫言最具代表性、象征性的作品。小说通过“童年视角”,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表现抗日战争期间在那里上演的一幕幕英勇激昂的故事,与以往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历史真实。小说发表后的近三十年的时间内,莫言一直忠实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高密东北乡”浩荡、磅礴的故事。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的缩影,成为一个类似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Gabriel G. Márquez)笔下的马孔多小镇的复杂的艺术世界。

《红高粱》小说的影响力并未局限在文学界,而是凭借其独有的魅力延展至电影界,从而获得跨媒介重生。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陈剑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朱伟编辑和莫言三位编剧,以小说《红高粱》为骨干,辅以小说《高粱酒》的部分内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又经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台本并拍摄为同名电影,1987年由西安电影制

^① 1987年由中篇小说《红高粱》发展为长篇小说的《红高粱家族》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包括《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五部分。